

主编·李子云
赵长天
陈思和



梁实秋批评文集

徐静波编

世纪的
回响·
批评卷



世紀的回响·批评卷

徐静波编

梁实秋批评文集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实秋批评文集/徐静波编

ISBN 7-80607-488-0

I. 梁…

II. 徐…

III. 评论-文学-中国

IV. I026

梁实秋批评文集

◎徐静波 编

责任编辑:成平 周 颖

装帧设计:王震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75 字数:215千字

版 次: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 7-80607-488-0/I·209

定 价:1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1955

讀杜詩疑

梁實秋手迹

薄倚

「上後園山脚」有句：「劍門乘正峽，薄倚造至今。」

薄倚一作倚薄。施鴻寶「讀杜詩疑」曰：「今按作倚薄是也。」

且引另詩三首句中皆作「倚薄」為證。

一、西園贈日：「題頭愧倚孱。」

二、贈李秘書別三十韻：「倚薄似稚。」

三、哀張氏：「倚薄正應。」

東坡九家注杜詩作「倚倚」，注：「薄倚即倒用謝靈運「相倚」。」

薄也。倚薄倒為薄倚，固無不可，但二字究不倚薄？」

梁實秋手迹

编辑说明

一、近年来学术出版界虽已注意“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作品和理论主张,但仍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或别具一格的作家或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或未被发掘,或作品虽经重印,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全貌,我们特编选这套丛书出版;

二、本丛书按照文章类别,分辑出版,每辑十本,第一辑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第二辑以文学评论为主,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以美学、文化争论等方面为主的学术文章。每书有一书名,体现该作家作品的风格面貌,另有一副题,标明作家、批评家或文化群体名称。每书的体例,分总序、本书序、正文及编后记。编后记说明编选者的尺度;

三、本丛书所选文章,一律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于报刊的原始文字。为保持作品的历史风貌,有些作者惯用的语言、某些观点,虽与今天的有所不同,我们仍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四、由于人力和编者学识的限制,编选中如有重要疏漏和错误,望行家和读者指正,以期改正。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将近八十个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八十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十年中，我们却也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忠诚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不管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总是在默默耕耘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吗?

解放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止,历时十四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一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唯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决不凭藉作品以外的力量来招揽顾客。话又说得很谦虚,只说这些作品决不是读了一遍就不想再读的书(其实这已足够了)。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

能够重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的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决定对将近八十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式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十本为一辑，辑数暂不规定，看以后的实际情况再定。准备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

受到重视的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一些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金灿灿的秋收(代序)

余光中

重九的后三日,梁实秋先生因心肌梗塞病逝于台北中心诊所,噩耗所及,国内海外莫不惊挽。尽管逝者寿登耄耋,且人若其名,华于春者终实于秋,然而秋声为商,斯文仍不免同感悲伤。迄今不满两月,报端争刊的悼文与报道已经将近百篇。可以想见,知性的盖棺评论,感性的追念散文,今后仍会陆续出现。这么沉重而响亮的丧钟,在台北,从胡适去世以来,已经很久不闻了。十一月十八日下午的凄风苦雨里,安息在北海公墓的那位老人,这一生,究竟做了些什么,值得文坛如此哀恸呢?

梁实秋先生对文坛与学府的贡献,可从下列五种身分来分析。

首先,他是一位散文家。《雅舍小品》之类的隽永散文前后发表了一百四十三篇,而相近的杂文也出过七册。这样的产量已经可观,加以雅舍的笔法清俊简洁,点到为止,文白相济,放而能收,引证则中外兼采,行文则庄谐并作,时或夸张而令人惊喜,时或含蓄而耐人寻思,乃成为“五四”以来有数的散文大家。梁氏的风格上承唐宋,下榘晚明,旁取英国小品文的洒脱容与,更佐以王尔德的惊骇特效,最讲究好处收笔,留下嫋嫋的余音。学者的散文夹叙

夹议，说理而不忘抒情，议论要波澜回荡，有时不免正话反说，几番回弹逆转，终于正反相合。钱钟书是此道高手，可惜不常出手。雅舍小品也有波澜，但是正反之势比较收敛。另一方面，比起鲁迅的恣肆泼辣，梁氏既要维持儒家君子的温柔敦厚，又要不失英美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公平精神，笔锋也显得不够凌厉。然而正如里尔克所说：“归根结蒂，唯一的防卫就是不设防。”鲁迅为文，以攻为守而攻势凌厉，热讽夹着冷嘲，有时流于人身攻击。钱钟书下笔，声东击西，忽反忽正，讽刺虽然犀利，却罕见牵涉私人，但在另一方面，也不怎么喜欢自谦。梁氏的幽默总是对事而不对人，笔锋所扫，往往反躬自嘲，最多是调侃亲人罢了。在幽默作家之中，梁氏是最爱低调的一位。在这方面，周作人、吴鲁芹、思果等等都与他同调。

梁实秋论散文，常提的几个主张也都是消极的低调。他认为现代散文有两大毛病：“一是太过于白话化，连篇累牍的‘呢呀吗啦’，絮絮叨叨，令人生厌。一是过分西化，像是翻译，失掉了我们自己的国文的味道。”至于一般的散文，则病在枝蔓而贪多，作者应该知所割爱，“把枝蔓的地方通通削去，由博返约。”他一再强调“简短乃机智之灵魂”，而且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也就因此，他甚至不满徐志摩，说徐“为文，尝自谓‘如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情横溢，究非文章正格”。

针对这些毛病，梁先生乃酌用文言的简洁以济白话的噜嗦，坚持中文的纯粹以解西化的生硬，而且寓深远之旨于简短的篇幅。于是他的正格文章，名副其实，都是两三千字以内的小品，风格在情趣与理趣之间，抒情而兼议论。

梁先生对翻译的贡献举世公认，其中分量最重的，当然是独力译完莎翁全集。成就如此的赫九力士大业(Herculean task)，“五四”

以来只有梁氏一人。莎剧三十七种，加上诗三卷，一共是四十本书，梁先生先后也翻译了近四十年（一九三〇至一九六七），这种有恒而踏实的精神真不愧为译界典范。或谓梁氏译笔忠于原文而文采稍逊，以为不足。此事一则见仁见智，一则原属两难，因为译文若要文采斐然，读来淋漓畅快，每每就失之不忠。梁氏的译本有两种读法，一是只读译本，代替原文，一是与原文参照并读。我因教课，曾采后一种读法，以解疑难，每有所获。梁先生自称他译莎剧的原则，“是忠于原文，虽不能逐字翻译，至少尽可能逐句翻译，绝不删略原文如某些时人之所为。同时还尽可能保留莎氏的标点。”

除了四十本莎著之外，梁氏还译了十三种书，其中如《沉思录》、《西塞罗文录》、《咆哮山庄》、《织工马南传》、《吉尔菲先生的情史》、《百兽图》、《潘彼德》、《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等，均为西方文学名著，论文体更遍及散文、小说、戏剧。就算他一本莎著都不曾译过，仍然可以翻译成家。

第三个贡献在文学批评。早在二十一岁时，梁氏即针对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写了《草儿评论》一文，并与闻一多评俞平伯诗集的文章合出《冬夜草儿评论》，成为新诗评论的早期文献。从那时起，一直到他四十一岁时发表《关于“文艺政策”》为止，二十年间他写了数量可观的评论文章，所论或为文学之本质，或为新文学之趋势，或为翻译之技巧，或为西洋文学之精神，在当时激起颇大的反响，甚至因此卷入了论战。黎明版的《梁实秋自选集》里，作者小传之末，曾谓梁氏“生平无所好，唯好交友，好读书，好议论”。季季在访问记里提起这句话，梁先生的回答是：“我好议论，但是自从抗战军兴，无意再作任何讥评。”自从一九四九年迁台以来，他果然少作文学批评，更绝不与人论战。所以台湾的一般读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但知有散文家梁实秋、翻译家梁实秋，甚至辞典编者梁实秋，

却不知曾有批评家梁实秋。其实，文学批评正是梁氏前半生文学事业之所在，其激荡之广，反应之烈，凡我国新文学史家皆难忽视。我们只要翻阅黎明版的梁氏自选集，就会发现所选文学批评与散文的分量，约为五与四之比，也可见梁氏对自己早年论文的重视。

梁先生二十三岁赴美留学。在这以前，他是热中浪漫主义的文艺青年，不但常写新诗，更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颇有交往。在他赴美前夕，创造社诸人甚至还邀他人入社。一九二五年，他在《论中国新诗》里更指摘胡适的《尝试集》平庸而肤浅，冰心的诗有理而无情，却推崇郭沫若最富诗意。但是美国之行把他带到新人文主义的门下，博学慎思的白璧德把他从浪漫的热血提升到古典的清明。这位留学生三年后回国，从此转头批评外来的浪漫倾向，成了古典的砥柱。

梁氏的转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受了白璧德的启发，一方面也因为受了新月社同人的影响，更因为左翼作家在文坛上日渐得势，甚至创造社都终于放弃浪漫文学而鼓吹革命文学。前述《论中国新诗》与翌年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两文之间，他的改向显然可见。在前文里他还称颂郭沫若的《女神》等诗具有激烈的情感、无涯的灵魂，很富创意，但到了后文里，他却回过头来指摘新文学运动的浪漫倾向，认为新文学太受外国影响，太推崇情感，流于印象主义，失之皈依自然且侧重独创。后三种浪漫倾向显然是卢梭的路向，而卢梭正是由外国舶来。梁氏秉承新人文主义，认为文学的大道在理性的节制与人性的常态，一位作家如果不能全面观察人生，即失之于偏激，亦即浪漫。也因此，他认为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都以偏概全，昧于常态，终于和左翼作家短兵相接，卷入了有名的鲁梁论战。

或谓那场论战应正名为梁鲁论战，其实倒也不必。梁实秋比

鲁迅小二十二岁，论战初起时，梁才二十五，鲁已四十七了，颇有幼犊对老虎之势。先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针对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发表了《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论战于是展开。其后两人交锋多次，而站在左翼立场相继评梁者还有冯乃超、韩侍桁等多人，一直要到一九三一年初，才告一段落。论战内容牵涉颇广，但主要争端在于：文学应该正视普遍的人性，抑或强调阶级性。梁实秋主张人性超乎阶级而且历久不变，文学表现的正是这种普遍而恒久的人性。鲁迅则认为人性因阶级而不同，更随时代而变化，不能一味要文学去处理抽象的人性。其实，人性与阶级性之争，不能视为鲁梁两人的私斗，也不能视为只是文学观念之分，因为在新月社作家甚至自由主义作家与左翼作家之间，这是迟早会爆发的争论。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念念不忘把梁实秋当做反面教材，说他是资产阶级文艺的代表。

梁实秋反对文学的阶级性，是错了吗？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不但半世纪前为然，即在今日，不少作家心中仍然会有困惑。若问左翼文人，则答案当然是梁实秋错了。若问其中从王实味、巴人、王叔明以迄后期的周扬这些人，则他们认为文学不能只讲阶级性。若问文革以后大陆崛起的新作家呢，他们的答案可想而知。经过文革的浩劫，“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犹厌言红卫兵吧，谁还对阶级斗争抱着幻想呢？只要看近如八十年代中期，“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成为大陆文坛争执的论题，就可知普罗文学并非至上的真理。

梁实秋当年面对老练而泼辣的前辈作家，面对人多势众又有组织的左翼阵营，敢于挺身而出，明确地指陈文学的本质，而为缪斯护驾，表现的不仅是智者的眼光，更是勇者的胆识。他不愧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为了维护文艺创作的自由与尊严，早在一九三一

年发表了《所谓“文艺政策”者》一文，批评鲁迅所译的《文艺政策》原来是俄共所议决，又在一九四二年发表《有关“文艺政策”》，反对张道藩在这方面的主张。于私，鲁是敌，张是友。但是只要事关文学，就不论敌友，只论是非。这也是有始有终，坚守原则。

一九三八年，正当抗战初起，梁先生接编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在《编者的话》里交代：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段话显然并未反对抗战文学，但在当日政治的紧张气氛下，却激怒了左翼阵营，惹来一场围攻，梁氏竟成了创导“抗战无关论”的罪人。一直到一九八〇年，在巴黎的抗战文学研讨会上，当日攻击过梁氏的罗荪等人，还不忘数其旧罪。今日回顾那一段《编者的话》，敢在那样的场合提出，教人惜其“不智”之余，仍然钦其“不怯”。所幸在巴黎会上，有梁锡华挺身为梁实秋辩护，而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柯灵更在上海文汇报刊出《现代散文放谈——藉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为梁氏平反。

第四个贡献在学术研究。其最著者，乃一百万言的《英国文学史》。此书从梁氏七十二岁写到七十八岁，历六年始成，但是等到一九八五年才出版，厚一八二五页，洵为巨著。其姊妹篇《英国文学选》同时问世，更厚达二六二二页，增加了梁氏在翻译上的成绩。他为远东版主编的各种英汉与汉英辞典，对莘莘学子甚至国外学人都颇有益处。

第五个贡献在教育。梁先生在大陆时代，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山大学，并主持青岛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外文系。来台后则在师范大学任教十六年，更担任过英语系主任，英语研究所主任，文学院院长。他在师大任内，先后设立了声誉卓著的英语教学中心，与规模宏大的国语教学中心，直接受教与间接获益的弟子，不可胜数。（以下删节）

一九八八年元旦于厦门街

（本文原为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由余光中编的《梁实秋先生纪念文集·秋之颂》的卷首文）